

中國古代文人的旅遊審美研究及啓示

劉相雨¹ 劉晨曦²

(1. 曲阜師範大學文學院, 曲阜;

2. 中國工商銀行濟寧分行, 濟寧)

摘要:本研究以中國古代文人的旅遊詩文為研究對象,探討了他們旅遊審美的不同方式及其對現代旅遊業的啓示。中國古代文人的旅遊審美,既有攀山越嶺的探險式旅遊,又有深度沉浸式的治癒式旅遊,還有重在體驗的文化旅遊。他們的旅遊審美,啓示現代旅遊業要不斷拓展旅遊的邊界,根據不同年齡、職業、心境人群的需要,提供不同的旅遊產品;旅遊業要深入挖掘各地的文化資源,通過不同方式,讓遊客在景物中“看見歷史”“觸摸傳說”。古代文人的“慢”旅遊方式,啓示現代旅遊產業設計一些長周期、深體驗的定制線路,實現“旅遊即修行”的目的。

關鍵詞:探險式旅遊;治癒式旅遊;文化旅遊;旅遊審美;旅遊詩文

中圖分類號:F590

Research on the Tourism Aesthetics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ti and Its Enlightenment

Liu Xiangyu¹ Liu Chenxi²

(1. School of Liberal Arts,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2. Jining Branch,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Jining)

Abstract: Taking the landscape travel works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ti as the research subje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ifferent modes of their travel aesthetics and the enlightenment they bring to modern tourism. The travel aesthetics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ti encompasses three major forms: adventurous travel featuring mountain climbing and ridge crossing, in - depth immersive healing travel, and experience - focused cultural travel. This revelation suggests that the modern tourism industry should continuously expand the boundaries of tourism and provide differentiated tourism

作者簡介:劉相雨,博士,曲阜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劉晨曦,碩士,中國工商銀行濟寧分行初級會計師。

products tailored to the needs of groups with different ages, occupations, and mental states. Furthermore, the tourism industry ought to deeply excavate cultural resources in various regions and adopt diverse approaches to enable tourists to "perceive history" and "touch legends" through the scenery. The "slow travel" mode practiced by ancient literati also enlightens the modern tourism industry to design long-cycle and in-depth experience customized routes, so a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travel as spiritual practice".

Key words: adventurous travel; healing travel; cultural travel; tourism aesthetics; tourism poetry and prose

2024年5月17日,全國旅遊發展大會傳達了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的重要指示,旅遊業“日益成為新興的戰略性支柱產業和具有顯著時代特徵的民生產業、幸福產業”。旅遊業上升為“戰略性支柱產業”“民生產業”“幸福產業”,標誌著它在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那麼,如何將旅遊業繼續做大做強,增強人民的幸福感和獲得感,是我們必須面對的問題。我國古代文人對於旅遊有著濃厚的興趣,曾經進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和考察,他們的旅遊體驗和審美視角值得借鑒和思考。

1 旅遊行為發生的條件

旅遊行為的發生,一般要同時滿足主觀意願和客觀條件兩大前提。主觀意願是指旅遊者要有旅遊的動機和心理需求;客觀條件是指旅遊者要有可自由支配的收入和自由支配的時間,另外交通是否便利、酒店和餐飲設施是否完善等等,也是影響旅遊行為的因素之一。旅遊行為發生的這些條件,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而是經過了一個漫長的發展歷程。

在“萬物有靈”的時代,大自然是外在於人的獨立的存在,雷電、暴風、火山、地震、

洪水、猛獸……都是令人恐懼的。天神、地神、山神、水神、樹神……各種神靈的存在以及人內心對於神靈的恐懼,使人類匍匐在神的腳下,對它們祇有敬畏和恐懼,沒有愉悅和欣賞。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人們的自我意識逐漸增強,對大自然的恐懼逐漸減弱。到了魏晉時期,人們開始主動地去親近大自然、接受大自然,試圖在大自然中獲得精神的愉悅和心靈的解脫。旅遊的動機和心理需求在這時開始萌芽。

魯迅認為,“曹丕的一個時代可以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文學自覺的前提是人的自覺,旅遊行為也是如此。當人不再是神的奴僕,旅遊行為才有了發生的可能性。李劍鋒認為,“相對於兩漢時期人的儒教化,魏晉時期的士人走向生命和精神的覺醒,能够在相當程度上擺脫僵化道德的束縛,以感性的生命及清新的價值觀去重新感受和面對社會、宇宙與人生”(李劍鋒, 2025)。人的覺醒、人的生命意識的覺醒,為旅遊活動的發生準備了必要的條件。

2 魏晉時期的旅遊:在自然山水中體悟玄理

謝靈運(385-433年)等是我國古代文人中較早地探索山水旅遊的人。謝靈運生

活於晉、宋易代時期，這一時期玄學盛行，文人們充滿了探討玄理的熱情，而玄理幽深，一般人是不容易理解的。於是，文人們便通過具體的物象去體悟玄理，變幻多姿的山水景色成為人們的理想選擇。能否欣賞大自然的山水，曾經一度成為評價一個人的文化檔次和文化水平的標準。

孫興公為庾公參軍，共遊白石山，衛君長在坐，孫曰：“此子神情都不關山水，而能作文？”（徐震堦，1984）

這裡的孫興公即東晉大名士孫綽，他與庾亮在遊覽白石山時，看到衛君長不能欣賞山水，遂對他的作文能力產生了懷疑。

謝靈運是東晉時期謝氏家族的重要人物，他的祖父是東晉名將謝玄。謝靈運在政治上是很不得意的。他“自謂才能宜參權要，既不見知，及常懷憤憤”（沈約，1974），後來被貶為永嘉太守，“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遊遨，遍歷諸縣，動逾旬朔，民間聽訟，不復關懷”（沈約，1974）。他擔任永嘉太守的時候，基本上不理政事，大部分時間用來旅遊。後來，他辭官不做，回到始寧縣別墅，“修營別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與隱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縱放為娛，有終焉之志”（沈約，1974）。謝靈運經常帶領下屬和僕人數百人，伐山開道，去尋找未被發現的美景。這種旅遊方式帶有探險的色彩，體驗性強，挑戰性突出，能夠深度融入自然環境，但是風險性較高。旅遊者在攀山越嶺和發現美景的過程中，獲得身心的滿足。

美國環境心理學奠基人斯蒂芬·卡普蘭（Stephen Kaplan）在“注意力恢復理論”（Attention Restoration Theory）中提出，人類的主動的定向注意力容易疲勞、耗竭，具有

遠離感、迷人性、延展性、兼容性的自然環境，可以幫助人恢復注意力、緩解心理疲勞與壓力，人類短期接觸自然即可緩解精神疲勞、提升專注力、改善情緒。謝靈運的探險式旅遊，是這一理論的生動注腳。

當然，謝靈運能夠這樣做，有他自己便利的客觀條件。他的祖父謝玄在始寧有別墅，其中有兩座山，“北山二園，南山三苑。百果備列，乍近乍遠”（沈約，1974），景色優美，物產豐富。

謝靈運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位大力寫作山水詩的詩人，他的山水詩對於後世有著重要的影響，如他的《石壁精舍還湖中作》：

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輝。清輝能娛人，遊子憺忘歸。

出谷日尚早，入舟陽已微。林壑斂暝色，雲霞收夕霏。

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趨南徑，愉悅偃東扉。

慮淡物自輕，意愜理無違。寄言攝生客，試用此道推。

該詩描寫了他從石壁精舍到湖中旅行過程中的見聞和感受。他早晨從山谷出發，返回時已經黃昏，這時候天色慢慢變暗，樹林、丘壑都帶上了一層暮色，天邊的晚霞也逐漸淡去，湖水中的芰荷、蒲稗相互依偎，似乎在為遊客送行。此詩最後四句“慮淡物自輕，意愜理無違。寄言攝生客，試用此道推”，就是他在遊覽山水時體悟到的玄理。甚至可以說，該詩前面所有的景色描寫，都是為這幾句玄理來服務的。而從文學上來說，前面的景色描寫已經具備了獨立的審美價值。此外，他的山水詩在當時影響很大，“每有一詩至都邑，貴賤莫不競寫，宿昔之

間，士庶皆遍，遠近欽慕，名動京師”（沈約，1974）。

袁行霈先生認為，“山水詩的產生，標誌著人對自然美的認識加深了。大自然已經從作為陪襯的生活環境或作為比興的媒介物變成具有獨立審美價值的欣賞對象。山水詩啟發人們從一個新的角度，即美學的角度去親近大自然，發現和理解大自然的美”（袁行霈，1987）。

謝靈運的旅遊行為，一方面是為了體悟玄理，這是當時士族文人的一種時尚行為；另一方面，也是為了表達他對於官場經歷的不滿，表現出與朝廷不合作的姿態。

可以說，謝靈運不但具有了旅遊的客觀條件，而且具有了旅遊的主觀願望。

與謝靈運的探幽尋奇不同，陶淵明則善於發現普通的、日常生活中的自然之美，如他寫炊烟，“曖曖遠人村，依依墟裡烟”；寫禾苗，“有風自南，翼彼新苗”；寫勞動，“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寫菊花，“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等等。這些詩句表面看不是在“遊山玩水”，但在旅遊學、旅遊文化裡，恰恰反映了一種核心的旅遊體驗價值。美國學者喬·卡巴金（Jon Kabat-Zinn）的“正念”（mindfulness）理論認為，消除疲勞不一定要通過壯麗景觀帶來的“震撼”或“暢神”，通過融入日常、細微、可及的“軟魅力”景觀，可以讓大腦的定向注意能力得到深度休整，並自然進入一種心無旁騖的正念狀態。

首先，在陶淵明的詩句裡，透露出一種悠然、閒適的心境。陶淵明從官場回歸到田園以後，他的精神得到了放鬆；他的生活不再是“為五斗米折腰”的屈心抑志的生活，

而是“悠然見南山”的自在生活。“悠然”是人在旅遊中的理想狀態，不刻意，不奔波，不焦慮，從容自在。一個“見”字，突出了他與南山是偶然相遇、無心而得，這恰好是深度放鬆、擺脫日常焦慮後才會出現的心理狀態。其次，陶淵明筆下的田園風光和鄉村生活，是現代鄉村旅遊、生態旅遊的文學原型。陶淵明雖無遠行的空間位移，卻實現了心靈的出遊與安頓。再次，陶淵明對鄉村生活的融入，是比單純欣賞美景更高的情感體驗。他從裊裊升起的炊煙中感受到了農村生活的平靜；從禾苗迎風招展的姿態，體驗到了自由生長的快樂；從鋤草後月光下的歸途中，體驗到了勞動本身的快樂。陶淵明這裡，勞動的艱辛、生活的苦難似乎都沒有了，有的是風雨之後的平靜與淡然。可以說，陶淵明的田園詩也為旅遊行為的發生準備了主客觀條件。

3 唐代的旅遊：在自然山水中發現自我、確認自我

唐代在我國歷史上是一個充滿生機和活力的時代，國力强盛，政治清明，經濟繁榮，文化發達。唐代進一步完善了隋代的科舉制度，這給了社會中下層知識分子進入官場的機會。他們為了科舉或做官，紛紛離開家鄉，到京城、邊塞或全國各地。雖然他們的主要目的不是旅遊，但旅遊是他們仕宦生涯的重要組成部分。

李白在年輕的時候，離開家鄉四川，乘船從長江東下，一路上飽覽了祖國的大好山川。他筆下的廬山，“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黃河，“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長江，“孤帆遠影碧空

盡，惟見長江天際流”；天門山，“兩岸青山相對出，孤帆一片日邊來”……李白的這類詩歌體現出一種極致的浪漫主義漫遊體驗。美麗的自然山水激發了李白的想像力和創造力，他的詩句也表達了對大自然的熱愛。

唐代的文人中，對於旅遊描寫最爲詳細、感受最爲深切的是柳宗元。柳宗元在自然山水中找到了知音，確認了自我，這種境界是大多數人難以達到的。

柳宗元(773-819年)在“永貞革新”失敗後，被貶爲永州司馬，在永州生活了十年，他的“永州八記”均寫於被貶期間，包括《始得西山宴遊記》《鈞鉤潭記》《鈞鉤潭西小丘記》《至小丘西小石潭記》《袁家渴記》《石渠記》《石澗記》《小石城山記》，其中前四記寫於元和四年(809年)秋，後四記寫於元和七年秋(812年)。

柳宗元在永州的旅遊，主要是爲了排解內心的鬱悶，“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與謝靈運的探險式旅遊有相似之處，如他到西山去，“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上”；他到小丘去，“剷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他到石澗去，“揭跣而往，折竹箭，掃陳葉，排腐木”……如果沒有探幽逐奇的好奇心，是不可能發現這些隱藏於山林之中的美景的。他不僅發現了大自然的美，更是改造了大自然。例如，經過他的改造後，小丘始呈現出嘉木、美竹、奇石等美景。

與謝靈運的探險式旅遊不同的是，柳宗元的旅遊是一種被貶謫境遇下的“治癒式旅遊”。與李白的豪情萬丈、陶淵明的悠然自得不同，柳宗元是在人生失意時走向山水，他的旅遊本質上是一場心靈的自我救

贖。柳宗元在對大自然美景的欣賞中發現了自我。他從這些景物的遭遇中，感受到了它們與自己同樣孤獨、寂寞的心情。他從大自然中找到了知音，從而使自己的心靈得到了安慰，如他在西山，體驗到的是西山不同於周圍小山的顥氣，“然後知是山之特立，不與培塿爲類。悠悠乎與顥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遊，而不知其所窮”。西山的這種顥氣與他本人被貶官以後仍然堅持自己的政治理想、毫不屈服的精神是一致的。他在遊覽小丘的時候，對於小丘雖有美景但因居於偏僻之地而遊人稀少，有很深的感慨，這與自己被貶於偏遠之地而不被朝廷重視的遭遇十分相似；他在遊小石潭的時候，感受到的是“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骨，悄愴幽邃”，在景色優美的大自然中，柳宗元的心情只是暫時獲得了安慰，並沒有完全放鬆下來。柳宗元這種旅遊，十分注重個人的旅遊體驗，也可稱爲沉浸式旅遊。

在“永州八記”的“後四記”中，柳宗元的這種體驗感和帶入感有所減弱，關注的多是各地的景色，如《袁家渴》“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衆草，紛紅駭綠，蓊勃香氣”；《石渠記》“風搖其巔，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石澗記》“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

柳宗元對於永州的這些美景未被世人知曉，深感惋惜，“永之人未嘗遊焉。餘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又怪其不爲之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

伎，是固勞而無用”，這種感慨貫穿於“永州八記”之中。從旅遊的角度來說，這種深度的沉浸式旅遊，對於大部分遊客來說，可能是做不到的。它需要旅遊者與遊覽對象的長時間的深度交流，只有那些時間比較寬裕的遊客，才有可能做到這一點。

4 宋代的旅遊：“慢”生活中的文化記憶和民俗風情

宋代文人的待遇優厚，他們有更多的機會出來做官、旅遊等。宋代的文人在旅遊的過程中，喜歡把自己旅途所見的景物、風俗、物產等用日記的形式記述下來，形成了日記體遊記創作的高潮，如張舜民的《郴行錄》、陸游的《入蜀記》、範成大的《吳船錄》、周必大的《歸廬陵日記》、呂祖謙的《入越記》、方鳳《金華遊錄》等（梅新林，俞樟華，2004）。其中，成就最爲突出的是陸游的《入蜀記》。

《入蜀記》是陸游乾道六年（1170 年）由家鄉山陰赴夔州通判任上沿途所寫的日記，這年陸游 46 歲。此前，他已經在家閒居了四五年。雖然夔州通判的官位不高，夔州又是十分偏遠的地方，陸游還是接受了任命。這年的閏五月十八日，他帶領全家，包括他的妻子和六個子女，從山陰出發，一路乘船，先後經歷了十五個州府，終於在十月二十七日到達夔州，全程歷時五個多月，行程五千餘里。陸游的這次赴任經歷，雖然不是專門的旅遊，但是他的這次經歷，卻給人們很多的啓發和思考。從《入蜀記》來看，陸游的這次經歷可謂是全景式的文化旅遊，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4.1 “慢”生活開啓了“旅”之樂

陸游的這次行程，歷時五個多月，時間

可謂長矣。但是，我們在《入蜀記》中卻看不到旅遊的疲憊之感和對於路途艱辛的抱怨、牢騷。

陸游的這次赴任，並沒有嚴格的時間要求，他有充裕的時間來欣賞沿途的風光。其實，陸游在乾道五年（1169 年）十二月六日，就接到了赴任的通知，“以左奉議郎差通判夔州軍州事”（《通判夔州謝政府啓》），但是由於要籌措路費以及做行前的準備工作，他直到第二年的閏五月才出發。

陸游的旅遊有一個顯著特徵：他不僅是看山水，更是看人、訪友、交遊，如他在六月的行程：

五日：早，抵秀州，見通判權郡事右通直郎朱自求、員外通判右承事郎直秘閣趙師夔、方務德侍郎滋。務德留飯。

六日：赴郡集於倅廨中。

七日：早，遍辭諸人，赴方務德素飯。

九日：知縣右承議郎管鉞、尉右迪功郎周邨來。

十四日：早，見知州右朝奉大夫李安國、通判右朝奉郎蔣誼、員外倅左朝散郎張堅。

二十二日：郡集衛公堂後圃。

八月三日，陸游到達了江西，這時才接到夔州送來的公文；八月二十三日，他到達鄂州時，才有夔州的士兵來迎接，“夔州逐兵來參”。

旅途之中，陸游還有許多意外的驚喜和收穫，如六月二十八日，經過鎮江金山時，他遇到了範成大，兩人八年前曾經同在京城的聖政所任職。此時範成大奉命出使金國，兩人在鎮江相遇，“奉使金國起居郎範至能至山，遣人相招食於玉鑒堂”。“他鄉遇故知”，其樂何如。

經過南京時，陸游見到了秦檜的孫子秦塤，兩人的關係似乎還不錯。秦塤還請陸游到家中，“延坐畫堂，棟宇閎麗，前臨大池，池外即禦書閣，蓋賜第也”。當時，陸游的家人生病，秦塤還為他們請來了醫生，“秦伯和遣醫柴安恭來視家人瘡”。紹興二十三年（1153 年），陸游在臨安應試的時候，因名列秦塤之前而被秦檜排斥。看來，時過境遷，陸游對此已經心無芥蒂。

旅途本身，也有他人難以體會的快樂。六月十一日，他乘船經過三山磯時，正趕上順風，船行迅速，艚公十分興奮、得意，擊鼓而行；而逆風的船隻，阻風停泊，艚公十分惱火，頓足詬罵，反映出人們不同的心態：

是日便風，擊鼓挂帆而行。有兩大舟東下者，阻風泊浦漈，見之大怒，頓足詬罵不已。舟人不答，但撫掌大笑，鳴鼓愈厲，作得意之狀。江行淹速常也，得風者矜，而阻風者怒，可謂兩失之矣。

這種旅遊過程中的小插曲，也帶給人不一樣的旅遊體驗。

從旅遊的角度來看，陸游在這段赴任途中的經歷，展現了一種從容、社交化、文化深度與生活情趣並重的“全景式慢旅遊”模式。

4.2 山水審美方式的變化與山水承載的文化記憶

旅遊的核心在“遊”。從審美方式上來看，陸游的遊山玩水，與現代的旅遊方式更為接近。謝靈運眼中的山水，是他體悟玄理的重要工具，一旦體悟到玄理，山水就成了可有可無的存在，即所謂的“得魚忘筌”“捨筏登岸”也。李白、柳宗元眼中的山水，寄

托了個人的人生命運和人生感慨，山水就是他們的知音，審美主體高度融入審美客體之中，很難將二者截然分開。陸游眼中的山水就是山水，他與審美客體之間始終保持著一定的距離，並不追求與審美客體的融入。他對於自然山水的態度主要是欣賞。

陸游的自然景觀旅遊，是一種多感官的旅遊體驗。他既能欣賞壯觀、闊大的遠景，也能欣賞秀美迷人的近景。

乾道六年（1170 年）六月二十八日早上，陸游在金山觀日出，“江中天水皆赤，真偉觀也”。他在《金山觀日出》詩中有“日輪擘水出，始覺江面寬。遙波蹙紅鱗，翠靄開金盤。光彩射樓塔，丹碧浮雲端”的描繪，可以與《入蜀記》中的記載互相印證。他離開金山時，“舟中望金山，樓觀重複，尤為巨麗”。

八月一日，陸游乘船經過小孤山，對於小孤山秀美的景色讚嘆不已，“自數十里外望之，碧峰巉然孤起，上干雲霄，已非它山可擬，愈近愈秀。冬夏晴雨，姿態萬變，信造化之尤物也”；與小孤山相隔不遠的澎浪磯，“三面臨江，倒影水中，亦佔一山之勝”。而彭郎與小姑的美麗傳說，又帶給遊人無限的遐想。陸游還特意引用了蘇軾的詩句“舟中估客莫漫狂，小姑前年嫁彭郎”來加深人們的印象。

美麗的景色固然吸引人，但是文化名人、歷史故事、民間傳說等方面的加持，使這些自然景觀同時擁有了文化的深度和厚度，提升了遊人的旅遊體驗。

陸游的旅遊，還是一場文化知識的實地學習過程。

乾道六年八月八日，陸游到了廬山，他

先後遊覽了太平興國宮、太平興龍寺、虎溪、羅漢閣；八月九日，陸游參觀了慧遠法師祠堂、聰明泉、卓錫泉、乾明寺、雁門市、西林寺等。這裡有明確的遊覽路線、景點參觀、停留住宿等，構成了完整的觀光遊覽行爲。遊覽太平興國宮時，陸游注意到，宋太宗時曾派遣太監給該宮送來“泥金絳羅雲鶴帔”；宋神宗時曾加封“應元保運真君”，並“賜塗金殿額”等。在遊覽慧遠法師祠時，他提到了“辟蛇童子”的傳說、神龍運木傳說以及唐代進士裴休的題字、張文潛的題詩、顏真卿的題碑等。陸游對這些名人的題字、題詩、碑刻以及相關傳說的介紹，帶領遊客進行了一次完整的文化知識的學習。

六月二十三日，在遊覽北固山頂的甘露寺時，陸游注意到了寺內的“狠石”：

有狠石，世傳以爲漢昭烈、吳大帝嘗據此石共謀曹氏。石亡已久，寺僧輒取一石充數，遊客摩挲太息，僧及童子輩往往竊笑也。

據傳說，劉備、孫權兩人曾經在“狠石”上共同商議對付曹操的策略。正史中對此事並沒有任何記載，但是這裡卻成爲一個著名的景點。晚唐羅隱的《題潤州妙善寺前石羊》，有“紫髯桑蓋此沉吟，狠石猶存事可尋。漢鼎未安聊把手，楚醪雖滿肯同心”之句。蘇軾的《甘露寺》詩序，記載“寺有石如羊，相傳謂之狠石。云諸葛孔明坐其上，與孫仲謀論曹公也”，故事的主角變成了諸葛亮和孫權。在《三國志通俗演義》中，“狠石”故事則演變爲劉備與孫權分別以劍剝石的“恨石”故事：

玄德更衣出殿前，見庭下有一塊石。玄德拔從者所佩之劍，仰天禱告曰：“若劉備能够回荊州，成王霸之業，劍揮石爲兩段。

如死於此地，劍剝不開。”言訖，手起劍落，火光迸濺，砍石爲兩段。忽然孫權後面而言曰：“玄德如何而恨此石？”玄德曰：“備年近五旬，不能與國家剿除賊黨，心嘗恨焉。今蒙國太招爲女婿，此平生之際遇也。卻才問天買卦，如破曹興漢，砍斷此石。今果然如此。”權暗思：“劉備莫非用此言瞞我？”亦掣劍與玄德曰：“吾亦問天買卦。若破得曹賊，亦斷此石。”卻暗暗祝告曰：“若再取得荊州，興旺東吳，石亦爲兩半！”手起劍落，巨石亦開。至今有十字紋“恨石”尚存。

《三國志通俗演義》中的劉備和孫權，各懷心事，在巨石前禱告發誓，以劍剝石，使“狠石”變成了“恨石”。

陸游告訴我們，有時候景物的“真偽”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能喚起怎樣的文化想像和情感共鳴。而這也是現代文化旅遊的核心之一：讓遊客在景物中“看見”歷史、“觸摸”傳說。遊客在旅遊中的核心體驗不是求真，而是情感上的連接。只要景物能够喚起他們的情感共鳴，就會帶來意想不到的效果。遊客消費的不僅是景點本身，還有附著在景點上的故事、記憶和情感。一個普通的石頭，因爲有了劉備、孫權的傳說，就成爲了值得“摩挲嘆息”的文化符號。

陸游喜歡引用前人的詩歌來加深對於景點的印象，同時又以對景點的實際體驗來加強對於詩歌的理解，如他在尋訪黃鶴樓故址時，提到了李白的《沔陽泛城南郎官湖詩序》《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杜甫的《公安送李晉肅入蜀餘下沔鄂》《登舟將適漢陽》、崔顥的《黃鶴樓》、黃庭堅的“宵征江夏縣，睡起漢陽城”等詩作。他認爲李白的“孤帆遠影碧空盡，惟見長江天際流”描述

真切，“蓋帆檣映遠山，尤可觀，非江行久，不能知也”；李白的“誰道此水廣，狹如一匹練。江夏黃鶴樓，青山漢陽縣。大語猶可聞，故人難可見”（《江夏寄漢陽輔錄事》）一詩“形容最妙”。在經過公安縣時，他提到了杜甫的《公安縣懷古》《曉發公安》《移居公安》《留別公安太易沙門》等詩歌；在經過長風沙時，他引用了李白的《江上贈竇長史》中的“萬里南遷夜郎國，三年歸及長風沙”，《長干行》中的“早晚下三巴，預將書報家。相迎不道遠，直至長風沙”，梅堯臣的《送方進士遊廬山》“長風沙浪屋許大，羅剎石齒水下排”等詩句；經過三江口時，他引用了李白的“山隨平野盡，江入大荒流”詩句。

陸游博學多識，他每遊一地，都要介紹與此相關的歷史典故、文化名人、神話傳說等等，使人興致盎然、遊興勃勃。陸游的旅遊，不僅加深了人們對於長江沿岸一帶大自然美景的欣賞和體會，還進行了一場文化的普及和推廣。

4.3 關注民俗風情，拓寬旅遊範圍

宋代以前文人的旅遊活動，多以自然山水為主，對民俗風情的考察與體驗相對較少。陸游的這次行程，關注了各地不同的民俗風情，拓寬了旅遊的範圍。例如，《入蜀記》中就多次記載了行船的禁忌與風俗。

過金山時，陸游“以一猗、壺酒，謁英靈助順王祠，所謂下元水府也”；經過巴陵一帶時，“見舟人焚香祈神，云：告紅頭須、小使頭、長年三老，莫令錯呼錯喚”；九月二十二日，“中夜後，舟人入祀峽神，屠一猗”；九月二十六日，“祭江瀆廟，用壺酒、特豕”；十

月二日，“舟人殺豬十餘口祭神”；十月十日，“以特豕、壺酒，祭靈感廟”。可見，行船條件越是惡劣的地方，相關的禁忌就越多。特別是經過長江三峽的時候，船夫對於水神的祭祀越來越頻繁、越來越隆重。

沿途各地民俗風情，也各有不同，如七夕節一般是在農曆七月七日，但是京口人以七月六日為七夕節，“蓋南唐重七夕，而常以帝子鎮京口，六日輒先乞巧，翌旦，馳入建康內燕”；富池的漁民，幾十家住在一艘大船上，“廣十餘丈，長五十餘丈。上有三四十家，妻子、鷄犬、臼碓皆具，中為阡陌往來，亦有神祠，素所未睹也”；新灘的婦女，多用木盎背水，“長二尺，下有三足，至泉旁，以杓挹水，及八分，即倒坐旁石，束盎背上而去”。另外，廬山一帶有放河燈的習俗，“有大燈球數百，自湓浦蔽江而下，至江面廣處，分散漸遠，赫然如繁星麗天”；廬山的太平興國宮，本是屬道教的，卻有屬佛教的白蓮會活動，來此焚香的人“車馬及徒行者憧憧不絕”，而佛教的東林寺的白蓮會反而不如這裡香火旺盛。

新灘水急石多，過往的船隻往往被灘底的石頭損壞，“非輕舟無一物，不可上下”，但是商人為了逐利，載貨較多，往往船毀人亡。官府本想派人鑿去灘底的銳石，但是“灘上居民，皆利於敗舟，賤賣板木，及滯留買賣，必搖沮此役”，結果很多年都無法消除行船的安全隱患。

陸游對不同地區民俗差異的記錄，讓遊客從視覺審美擴展到對他人生活方式的理解與共情。各地風情差異巨大，滿足了遊客對新奇事物的探索欲。而新灘居民為私利阻礙官府除石，揭示了經濟利益與公共安全

的衝突，讓旅遊體驗中多了一層對社會人性的觀察。旅途中的行船條件越是惡劣，祭祀越頻繁、隆重，這種對危險的應對方式，讓遊客感受到旅途中的真實挑戰與當地人的生存智慧。

總之，真正深刻的旅遊體驗，往往源於對異地生活細節的敏銳捕捉與尊重，而非僅僅對風景的打卡。

4.4 對於群體旅遊中交通與醫療的重視

群體旅遊與個體旅遊有很大的不同。群體旅遊由於遊客的身份地位、文化素養、愛好興趣、身體狀況等各有不同，組織起來難度較大，需要注意的問題也更多。宋代以前的文人旅遊，多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之間的結伴旅遊，組織起來難度不大，旅遊中的風險也較小。陸游的這次旅遊，由於是帶著全家人赴任，而且路程長、時間久，旅遊中的風險問題就更加突出。陸游在《入蜀記》中主要關注到了兩個問題：交通問題和醫療問題。

陸游的這次出行，一路上換了五次船。第一次換船是六月二十日，在鎮江附近的潮閘，他搬到嘉州王知義的船上。第二次換船是在九月十七日，他在沙市搬入嘉州趙青船，這是過長江三峽的專用船隻“入峽船”。第三次是在九月二十六日，陸游的家人搬入新船。第四次是十月十五日，因為所乘船只損壞，無奈換船。第五次換船是在十月十八日，陸游在歸州換乘“艫船”，這種船“底闊而輕，於上灘為便”。換船，主要是為了安全，不同類型的船隻適應不同的航線、水域。但是每次換船，都需要把所有的行李搬到新船上，這又是十分繁瑣的。

旅遊的過程中的醫療問題，也是不容忽視的。陸游這次旅途，就多次請醫生看病。

陸游離家不久，他的妻子和兒子就中暑了，在嘉興請了姜姓醫生來看病；到了吳江縣，他又托人請了醫生鄭端誠來給兩個兒子看病。在南京，他托江寧縣令何作善請了醫生劉仲寶，秦埧也派了醫生柴安恭來給陸游的家人看病。到了安徽當塗縣，陸游也生病了，請了醫生郭師顯來看病。在蘄口鎮，陸游“買熟藥於蘄口市。藥帖中皆有煎者所須，如薄荷、烏梅之類，此等皆客中不可倉卒求者”。八月二十九日，陸游請了醫生趙隨為女兒靈照看病。

旅遊中，如果沒有醫生或藥物來保障旅遊的安全，旅遊的體驗感和娛樂性會大大降低。

5 古代文人的旅遊審美對現代旅遊產業的啟示

中國古代文人的旅遊實踐與審美觀念，雖然植根於具體的歷史環境，但其精神內核與體驗方式，對當下高速發展的現代旅遊產業具有深刻的借鑒意義。尤其是在旅遊業被定位為“戰略性支柱產業”和“幸福產業”的今天，如何提升旅遊的文化內涵、情感深度與人文關懷，古人早已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資源。

5.1 從“打卡式觀光”走向“沉浸式體驗”：重拾旅遊的初心

旅遊的本質，就是暫時脫離日常固定生存空間與重複生活秩序，借遠方的天地與人文，治癒當下的自己，看見更廣闊的世界與完整的自我。但是，現代旅遊常陷入“到此

一遊”的淺層模式，人們步履匆匆，每到一地，都忙著拍照、打卡，而忽視了最為重要的心靈的參與。而無論是陶淵明“悠然見南山”的閒適，還是柳宗元在永州山水中的深度沉浸，都強調旅遊是一種內在的精神對話，人在與大自然的深度交流中療癒自己。這啓示現代旅遊產業可以設計一些長周期、深體驗的定制線路，更多鼓勵遊客慢行、靜觀、沉思的產品，如禪修之旅、文學尋踪、自然療癒等，引導遊客從“看風景”轉向“感受風景”，真正實現“旅遊即修行”，重拾旅遊的初心。

5.2 文化旅遊的核心在於“故事”與“記憶”

陸游《入蜀記》中的旅遊，是將自然山水與歷史典故、名人軼事、詩詞歌賦、民間傳說等等緊密結合在一起。甘露寺前的“狼石”，因劉備、孫權的傳說而成爲文化符號；小孤山因蘇軾的詩句而更具魅力。這說明，遊客消費的不僅僅是自然景觀，還有附著其上的文化敘事與情感共鳴。現代旅遊開發不能止步於“建景點、收門票”，而應深入挖掘當地文化資源，通過故事化講述、場景化還原、沉浸式演繹，讓遊客在景物中“看見歷史”“觸摸傳說”。文旅融合的核心，正是將靜態景觀轉化爲可感知、可共鳴的文化敘事，讓靜態景觀“活”起來，使遊客在行走中完成一場跨越時空的文化對話。

5.3 “全景式旅遊”理念：拓展旅遊的邊界，關注生活整體

陸游的旅程不僅是山水之遊，更是社會之遊、民俗之遊、生活之遊。他記錄船夫祭祀、七夕節俗、水上人家、背水婦女，甚至關

注交通換乘與醫療保障。這種“全景式”視角提醒我們：真正的旅遊體驗源於對異地日常生活的理解與共情。現代旅遊產品可超越傳統景區，發展社區旅遊、非遺工坊體驗、鄉村生活營等，讓遊客走進當地人的生活肌理，感受真實、多元、有溫度的地方文化。另外，旅遊體驗還涵蓋了交通、住宿、餐飲、醫療等全環節，而完善的基礎服務設施往往是遊客“獲得感”的隱形基石。

5.4 “慢旅遊”與可持續旅行：回歸旅遊的本質節奏

陸游五個月行程五千餘里，不疾不徐，從容訪友、賞景、讀書、作詩。這種“慢”不是低效，而是對時間與空間的尊重。在快節奏的現代社會，人們更渴望“逃離”與“喘息”。因此，發展“慢旅遊”（Slow Travel）模式，如徒步古道、運河夜泊、書院研學等，不僅契合當代人对身心平衡的需求，也有助於減輕熱門景區壓力，促進旅遊資源的均衡利用與生態保護，實現旅遊業的可持續發展。

5.5 細分市場需求，提供差異化旅遊產品

古代文人的旅遊已呈現出明顯的類型分化：謝靈運的“探險式旅遊”滿足了對新奇與挑戰的追求；柳宗元的“治癒式旅遊”契合了情緒調節與心靈慰藉的需要；陶淵明式的日常審美則爲鄉村旅遊、生態旅遊提供了原型；陸游的“文化旅遊”則迎合了知識獲取與文化認同的訴求。這啓示現代旅遊業：市場是分層的，不同年齡、職業、心境的人群需要不同的產品供給。從青少年研學遊、中青年減壓遊，到老年康養遊、文化深度遊，應針對性地設計產品、定價策略與營銷

話術,以精準匹配遊客的多元心理需求。

綜上所述,中國古代文人的旅遊審美,以其深厚的人文情懷、細膩的感官體驗、廣博的文化視野和從容的生活態度,為現代旅遊產業提供了超越商業邏輯的價值指引。未來的中國旅遊,若能將“詩意棲居”的古典智慧融入產品設計與服務理念,必能在全球旅遊市場中走出一條兼具文化深度、情感溫度與生態高度的獨特道路,真正實現“幸福產業”的時代使命。

參考文獻

- [1] 李劍鋒. 陶淵明與中國詩歌意境的誕生. 山西大學學報, 2025(6): 71-80.
- [2] 柳宗元. 柳宗元集. 中華書局, 1979: 762-773.
- [3] 陸游. 入蜀記 (錢易生, 箋注). 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24: 29-32.
- [4] 魯迅. 魯迅全集 (第三卷).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5: 526.
- [5] 羅貫中. 三國志通俗演義.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520-521.
- [6] 梅新林, 俞樟華. 中國遊記文學史. 學林出版社, 2004: 207.
- [7] 沈約. 宋書. 中華書局, 1974: 1753-1775.
- [8] 新華社記者. 堅定走好獨具特色的中國旅遊發展之路——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指示引領旅遊強國建設開創新局面. 光明日報, 2024-05-18(001).
- [9] 徐震堦. 世說新語箋注. 中華書局, 1984: 261.
- [10] 袁行霈. 中國詩歌藝術研究. 北京大學出版社, 1987: 383.
- [11] 張兆勇. 謝靈運集箋釋.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7: 37.